

余 意 著

明代词学之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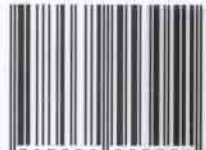


明代词学之建构

MINGDAI CIXUE ZHIJIANGOU

上架建议：古典文学研究

ISBN 978-7-5325-5305-1



9 787532 553051 >

定价：4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明代词学之建构

余 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7.23

V77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词学之建构/余意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25-5305-1

I. 明... II. 余...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明代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065 号

明代词学之建构

余 意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9 插页 2 字数 432,000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305-1

I·2096 定价: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绪论 / 1

- 一、“词亡于明”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 1
- 二、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 / 10
- 三、重建明词研究的思维与理路:悬置先见、直面本体、再造话语 / 27

第一章 “词萃吴中”与吴地文化意识 / 31

- 一、“词萃吴中”的历史机遇 / 31
- 二、吴中文人日常文化生活与文化意识 / 34

第二章 词学功能的拓展及词学观念的新变 / 40

- 一、宋、明词产生的文化背景比较以及明词之新变 / 42
- 二、题材倾向的新变 / 47
- 三、传播方式的改变 / 54
- 四、词的新功能 / 57

第三章 明代吴中词脉延续的群体性特征 / 62

- 一、吴中词人群体的内部构成特征 / 62
- 二、吴中词人群体的亚群分析 / 73

第四章 南方文化意识与明代早期词学思想 / 109

- 一、吴中文化意识演变与明代词学的历史分期 / 109
- 二、明代初年吴地的南北词风与明代吴地词风的推演 / 117
- 三、明代前期的词学意识:从博雅兼综到偏向苏轼、刘过词风 / 130

第五章 南方文化意识与明代后期词学思想 / 137

一、六朝文风、《花间集》与明代中后期“花间”词统的建构 / 138

二、“花间”词统与明代中后期词之“寄托”说的深化 / 157

三、尊体、辨体与本色、正变 / 170

四、“南唐”词风与明代中后期词学思想之反思 / 197

结语 “词学吴中”与明代词学 / 204

附录 / 207

一、明人词学序跋、词话汇辑 / 207

二、明词评汇辑 / 315

三、《全明词》漏收词补目 / 402

四、《全明词》失误举正 / 418

五、明词人生卒年考三则 / 426

六、二十世纪以来明代词学研究总目 / 428

参考文献 / 452

后记 / 460

绪 论

词学有广、狭两义,狭义词学专指词学理论,广义是指有词即有学,包含词学理论以及对某一特定时代词的产生、发展以及作品的研究。本书采取广义观照,对明代词以及词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明词本身进行规律性研究,总以“词学”名之。

明清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明代词以及明代词学很难真正进入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状况的形成与明清以来的思维定势相关,即“词亡于明”。因此进入明代词学或者明词研究,辨析的第一个问题无疑是“词亡于明”。按照韦勒克的说法,文学研究的特点,不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其精细之处在于“解释、分析和评价等”^①。为了能够理解明词,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之下,我们首先来辨析“词亡于明”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考察观念之后的观念,希冀能够适当地评价明词。

一、“词亡于明”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在一般的认识中,词源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中兴于清。这种认识如果仅仅视为历史演进中的相对性判断,似乎不算太错。赵尊岳曾经说过:“有明以三百年之享国,作者实繁有徒,必以衰歇为言,未免沦于武断。”^②又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明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明

① 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31页,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代有词,并且词人、词作的数量不在宋代之下。对明词的判断与明代存在大量词人词作的事实出现了分歧,是不是明词仅仅只具备数量意义呢?还是“词亡于明”的判断来自某种价值观过滤之后的结果?是判断力的问题,还是明词本身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采取悬置研究对象的方法,对产生“词亡于明”观念的判断力进行批判。于是,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历史的语境当中,对这种观念的历史形成进行一次考察,对“词亡于明”观念来一次“考古”。

“词亡于明”与判断观念相关

首先,我们从明词接受的两例典型事件来正面回答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来证实“词亡于明”的确是某种价值评判标准不同所导致的结果。其一是明清人对马洪词的不同评价。如淹博多才的杨慎,被时人誉为“当代词宗”^①,在其《词品》中盛推明代词人马洪,但马洪在清代是受到极力贬斥的对象,这当以朱彝尊的评价最具代表性,“钱唐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②然杨慎却说马洪:“善诗咏而词调尤工。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褻然若贵介王孙也。尝题许应和松竹双清扇景词云(略)。盖多丽词也。许东溟以为可追踪康伯可,可谓信然。又题梅花《江城引》云(略)。清气逸发,莹无尘想。又题许东溟小景《昭君怨》云(略)。言有尽而意无穷,方是作者。”^③评价不可谓不高。第二个例子是明清之际出现的几部明词选本对明词所作出的高度评价。如刊行于顺治末期的由王士禛、邹祗谟编选的《倚声初集》,辑录了明代天启以后的明词,王士禛在序言中说:“《词统》一书,稍撮诸家之胜,然亦详于隆、万,略于启、禛,邹子与予盖尝叹之。因网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闱之制,汇为一书,以续《花间》、《草堂》之后,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无闻,亦犹尼父歌弦之意也。”^④编辑词选的目的非独仅仅因为保存一代史籍,通过词选后王士禛的评语,我们仍然可以捕捉到王士禛对这段时期词的歆美之情。另外有刊行于顺治、康熙年间由清初人顾

① 明周逊《刻词品序》,杨慎《词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清朱彝尊《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③ 明杨慎《词品》卷六,《词话丛编》本。

④ 清王士禛《倚声初集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璟芳、李葵生、胡应宸编选的《兰皋明词汇选》和由张渊懿、田茂遇编辑的《清平初选》。这些词选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选始于顺治十六年乙亥(1659),而成书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其刊版亦在是年”^①的《兰皋明词汇选》,认为:“博搜三百年骚雅,纵陈而扬扨之。上自帝王,降而卿大夫,至山林方外、思妇劳人,为忧为乐皆得自言,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怒,且忠孝亦托闺房,温柔要于忠厚,骚坛之意旨不减风诗,盖于今称极盛矣。”^②将明词提升到“风、骚”高度,充分肯定明词的成就。可是等到清代浙西词派一建立,明人词的地位就急转直下,一些诸如“俗”、“浅”等评语几乎就成为明词一无是处的定评。从上举明词接受的两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同一对象,不同的批评者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毫无疑问则是由于每个批评者的先见在同一对象呈现的必然结果。可见明词之亡在一定程度上与不同评价者所持有的不同观念相关。

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紧接着从历史角度来总结使明词衰亡的三个观念,正是这三个观念使明词被放逐于词学殿堂之外。

“一代有一代文学”观念与“词亡于明”

自中唐以后,中国文化精神已然进入收缩期,文化心态变得内敛。伴随着文化的全面繁荣,对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探索,“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其中之一。这一发轫于金、元时期的文学命题,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词学,同样难以逃脱这个命题的束缚。“词亡于明”就产生于这个大背景下。

结合着明代的总体带有复古特征的文艺思潮特别是诗学思潮,明人面对当代人所作的词,针对宋人在词学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似乎自信心不足。因此在他们的词学批评中,强化了词作为宋朝的“一代文学”的地位。明人茅一相说:“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

^① 《兰皋明词汇选·本书说明》清人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编选、曾昭岷审订 王兆鹏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清顾璟芳《兰皋明词汇选序》,清人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编选、曾昭岷审订 王兆鹏校点《兰皋明词汇选》,《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①还有钱允治说:“窃意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宋人之词、金元人之曲,各擅所能、各造其极,不相为用,纵学窥二酉,才擅三长,不能兼盛。”^②表现在词学批评当中,明人批评明词时首先已经将宋人标准横亘胸中。即使受到后人赞扬的一些明代词家在明人眼里也不得不矮宋人三分。如陈霆《渚山堂词话》“刘伯温《写情集》”中说:“刘伯温《写情集》,皆词曲也。惟其大阙颇窒滞,惟小令数首,觉有风味。故予所选小令独多,然视宋人亦远矣。”^③认为刘基小令虽具风味,但与宋代词相比较,已然落入第二义。持有此种观念的还有王世贞,他在其《艺苑卮言》中评价明代三位大词人时说:“我明以词名家者,刘诚意伯温,秣纤有致,去宋尚隔一尘。杨状元用修,好人六朝丽事,似近而远。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④对于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的词人,评价时却采取某一特定时代的美学标准,现在看来于明人多少有失公允。

“一代有一代文学”观念的词学研究秉持的词学理念无疑是以宋词所呈现的美学风格。清代人在词学研究中总是称自己绍继两宋词,鄙薄明人词之不足观,并依据自己的一些理解来“托古改制”,并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词学理论体系,进而将自己的理论神圣化为宋人的词学标准,从而限制明词的准入。衍化生成的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理论就认为明词基本是处于衰亡的状态。延续到20世纪,加之现代学术奠定者王国维的推波助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基本成为了20世纪结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理念。因此通常的词学通史性叙述中,将大量笔墨抛向两宋词,而对衰亡的明词往往不作深究,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因为在“一代有一代文学”的影响下,明清是小说等俗文学的天下,丰富的文学历史被简单的线连缀起来的似乎明白的单一所代替,所谓词至明已经衰亡了,不值一叙。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如下词的通史性著作:刘毓盘《词史》、胡云翼《中国词史略》、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这些著作几乎继嗣着

① 明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② 明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③ 陈霆《渚山堂词话》,《词话丛编》本。

④ 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

先前的词学研究思维:强化词亡于明,或者明代是词的衰亡时代,并进而考索词为何在明代衰亡。如刘毓盘《词史》认为“明词”“不振”;王易《词曲史》认为词到明代“入病”;吴梅《词学通论》认为“明词芜陋”,“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胡云翼《中国词史略》认为:“明代韵文擅长南曲,词坛与诗坛一样没有生气,许多词人都是高标着‘北宋’或‘晚唐五代’的旗帜,徒然抄袭古人。不能自出新意,故没有什么好成绩表现出来。在三百年的明代词坛中,我们只能举出下列的几家(刘基、高启、杨基、杨慎、施绍莘、陈子龙、沈谦、邵梅芳、沈宜修与叶小鸾),是读者较为满意的。”^①在这些通史性研究当中,重申了以前“词衰亡于明”的观念。正是这些言论构造了20世纪明词研究的基本格局,成为明代词学综合宏观研究的经典语言。他们在其著作当中也深入探讨了明词衰落的原因,而对明词本身的研究已经退居第二线,说明明词为何衰落倒成为了兴奋点。这一问题在单独发表的论文中也多被关注体现,如周宗盛《元明两代是词的没落时代》^②,并且进而探讨词为何在明代衰亡的原因,如郑骞的《明词衰落的原因》^③等等。

浙西词派之“醇雅”观念与“词亡于明”

康、乾间,随着大清帝国文治、武功的完成,清代才真正树立起属于清代的学术品格。反映在诗学观念上是王渔洋“神韵”说的出现以及渔洋《秋柳》诗的大量和作,同时中国古代词学也彻底改朝换代了,其中明显标志是浙西词派的建立。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朱彝尊以雅正相尚,认为明代词风衰落是因为《草堂诗余》的盛行,为扭转明代风气,他“选《词综》,自唐开元,凡三十八卷,一以雅正为宗,诚千古词坛之圭臬也。其所自作,浓淡相兼,疏密相称,深得风雅之正。”^④朱彝尊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

① 胡云翼《胡云翼说词》3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周宗盛《元明两代是词的没落时代》,《大华晚报》第7版,1978年11月26日;12月10日。

③ 郑骞的《明词衰落的原因》,《大陆杂志》第15卷第7期,1957年10月15日。

④ 清陈廷焯《词坛丛话》,《词话丛编》本。

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①

明代词坛上劲吹《花》、《草》香风，明末词人徐士俊曾非常形象地说：“《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花间》、《草堂》在清人看来是明代词学的标准，特别是《草堂诗余》，全盘否定《草堂诗余》，无疑就将《草堂》影响下的明代词坛全部否定了。可朱彝尊并没有激烈地否定明词，清代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朱竹垞不非薄明人”：“竹垞《黑蝶斋词序》云：‘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或寡矣。’治案：论词未尝非薄明人。”^③的确，朱彝尊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明词，朱彝尊《词综·发凡》：“明初作手，若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皆温雅芊丽，咀宫含商。李昌祺、王达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钱唐马浩澜以词名东南，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殆不可医。周白川、夏公谨诸老，间有硬语。杨用修、王元美则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当遍搜文集，发其幽光，编为二集，继是编之后。”“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④朱彝尊似乎也没有拿捏准，在三百年中的明词是否有合姜、张之作？总的来讲，朱彝尊却是在反对明词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说：“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⑤很明显，这种主张是直接针对明词而来，而且认为“基之后得其门者，或寡矣”。杨基是明初人，杨基之后能得到门径的人很少，这等于实际上否定了明词。近人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竹垞有言：‘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此在竹垞当时，自有两种道理：一则词至明季，尽成浮响，皆有高谈《花间》、《尊前》，鄙南宋而不观之过，故以此语矫之。二则竹垞专宗乐笑翁，遂开二百年浙西词派，得力正在宋季，自言其所致力也。”^⑥但朱彝

① 清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引自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八，《词话丛编》本。

③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词话丛编》本。

④ 朱彝尊、汪森《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⑤ 朱彝尊《乐府雅词跋》，《曝书亭集》，《四库全书》本。

⑥ 陈匪石编著《宋词举·外三种》钟振振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尊出于保存一代文献的目的曾选明词数卷,惜没有刊行。后来王昶继承朱氏遗志编选《明词综》,“选择大旨,亦悉以南宋名家为宗,庶成太史之志云尔。”^①显然,该词派是以南宋词的美学标准评判明词的。

雅的对立面是俗,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对非常关键的范畴。从本原上讲,词是属于俗的。它是切合中唐以后平民阶层的兴起以及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文体。因此词一开始就带有几分脂粉气、娇娆态,即使被后人奉为词坛鼻祖的温庭筠,在当时仍被称为“无行文人”。但在历史演进中逐渐雅化,至南宋末达到鼎盛。但自从明中叶简便易行的心学盛行以来,俗风大昌,词自当不能免俗。另词在明人意识里属于乐府系列,外在形态与六朝相近,倡导六朝的“风华情致”之美,在词中重情感宣泄,风格与南宋以来的词风是背道而驰的。

可以说《草堂诗余》是明代的经典词学读本,据李康化《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研究》^②统计,明代《草堂诗余》的版本有33种。在《草堂诗余》的催化下,出现了一批追随《草堂诗余》趣味的词学选本。胡云翼说过在中国词史上存在两类选本,“大体说来,《花间集》、《草堂诗余》、《花草粹编》(还有《词的》之类)是一条线索;《乐府雅词》、《绝妙好词》《词综》、《词选》、《宋词三百首》又是一条线索。前者近俚俗,后者崇雅。”^③如实说,《草堂诗余》并非是俗到家的词学选本,况周颐《蓼园词选序》:“唯《草堂诗余》、《乐府雅词》、《阳春白雪》较为醇雅,以格调、气息言,似乎《草堂》尤胜。中间十之一二,近俳近俚,为大雅之小疵。自余名章隽句,撰录精审,清雅朗润,最便初学,学之虽不能至,即亦绝无流弊。”^④由此可知,明代词风的趋俗性并非是学习《草堂诗余》的必然,而是明人的精神、文化气质浇灌的结果。明代社会的趋俗性造成了明词的直率,这恰与清代经学复兴的人文背景是相悖的。如朱彝尊本身就经学著名,著作有《古文尚书辨》一卷、《孔子弟子门人考》一卷、《孟子弟子门人考》一卷、《经义

① 清王昶《明词综》,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② 李康化《明清之际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

③ 胡云翼《试谈唐宋词的选注工作》,《胡云翼说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况周颐《蓼园词选序》,清黄苏《蓼园词评》,《词话丛编》本。

考》三百卷，康熙南巡时曾赐御书“研经博物”匾额^①。不难分析，朱彝尊是以一己之“醇雅”的审美理想来对明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正如朱氏本人所讲：“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②目的很明确，倚声崇雅为的是“宣昭六义，鼓吹元音”。自此，明词在后来的清人的批评视野中消失了，如丁炜说：“方今乐府选本，盛推朱竹垞《词综》为最”，并在康熙戊辰仲春为徐钊《词苑丛谈》作序，提出：“余独慨夫词肇于唐，盛于宋、元，熄于明，迄我昭代，彬彬大振……盖词既中熄于明，刘、高、杨、瞿而后，鲜有继轨。”^③明词就这样被明确地判定为衰亡了。

常州词派之“寄托”观念与“词亡于明”

嘉庆、道光而后，词坛弥漫着反对浙西词派思潮，崛起了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张惠言以春秋公羊学经学家的眼光对历来的词进行解读，将词旨追溯到诗骚那里。此派最为重要的释词方式即贯穿以寄托观念，词学旨趣求渊深。清人谢章铤《张惠言〈词选〉跋》这样评价清代两代词学流派：“昔竹垞撰《词综》以雅为宗，读《词综》则词不入于俚。读皋文此选，则词不入于浅。且使天下不敢轻易言词，而用心精求于六义。”浙派末流染上琐屑短钉之习，张惠言编辑《茗柯词选》，“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秦之面目。”^④词本来是属于俗的，但如何能上攀风雅，周济所说的“铸”字大可玩味。张惠言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小道之“词”，在理论追求上讲“意内言外”、“寄托”。到周济讲究寄托，演化到由浙入常的陈廷焯，论词主张“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推崇作品的深厚之旨、渊深之笔，“一本温柔敦厚，以上溯国风、《离骚》之旨”^⑤。对明词，陈廷焯说：“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闰仙辈出，淫词秽语，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清朱彝尊《静惕堂词序》，《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丁炜《词苑丛谈序》，清徐钊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④ 清周济《存审斋词自序》，清光绪十八年周恭寿刻《求志堂存稿汇编》本。

⑤ 清包荣翰跋《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本。

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①并认为:“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不过一陈人中而已。”^②“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不可有才子气。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也。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扬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故得病最深。”^③作诗、作词切忌轻薄、浅露,而这些正好是明代词人所不追求的境界。于是乎陈廷焯就高唱“词亡于明”的论调,他的这种声音在明词研究中显得最为突出,也是历来明词研究中最具致命、最具颠覆性的一笔。明词研究由此进入了低谷。

需要指出的是,陈廷焯的词学理论,除了接受常州词派的理论外,还糅杂进了古代的诗教理论。如“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风骚为诗词之原”、“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④在词的境界上崇尚以深、厚、和平为祈向的“沉郁顿挫”,说词“必须沉郁顿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则不失之浅露,即难免平庸。”^⑤

后来的况周颐秉持“重”、“拙”、“大”的词学理想,因此对明词的评价是:“明以后词,纤庸少骨。二三作者,亦间有精到处。但初学抉择未精,切忌看之,一中其病,便不可医。”^⑥他只是承认明末词,认为“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若祝希哲、汤义仍(义仍工曲,词则敝甚)、施子野辈,倭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葑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⑦和陈廷焯相比较,况周颐虽然没有在整体上否定明词,并对明末词给予了相

①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

②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

③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

④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词话丛编》本。

⑤ 同上。

⑥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词话丛编》本。

⑦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

当高的评价,但将明代大部分时段的词看作是中国词史上的人病期,却是相同的。

从张惠言到况周颐,词学主导思想中始终存在着寄托理念之下的求深、求重、求拙的趋向。联系明代人的词学观念以及词学创作,符合此派词学理想的作品几乎很少。明人主张“诗余以宛丽流畅为美”^①，“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词须浅近,晚唐诗文最浅,邻于词调,故臻上品”^②,明人以浅而有致为审美理想,他们讲究词之本色,“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③,意为宁要本色,不要不伦不类之雅,因此常州词派的词学意趣以及陈廷焯的“沉郁顿挫”的理想是不符合明词实际的。所以不管是浙西词派,还是常州词派,对明词几乎是异口同伐,这是由于他们都认为明词具有他们所不能认可的“俗”气。正如陈廷焯自己所言:“有明三百年中,习倚声者,不乏其人。然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竟无一篇满人意者,真不可解。”^④鲜明地表达出自己词学观念的专制特色。

二、吴中词学与“词亡于明”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清代以来对明代词学进行判断的标准是存在问题的。当然,对有问题的判断标准进行批判,并不意味着明词本身已成免检产品。严迪昌关于20世纪词学总结时认为词学研究应有“‘异量美’式的气度”^⑤,其高足张仲谋由此提出明词的“异量之美”^⑥。结合两位先生之高见,则是研究明词应以“‘异量美’式的气度”欣赏明词的“异量之美”。但欣赏明词的“异量之美”仅仅停留在感性感知的层面、从词的外在表征注意到明词与传统词的不同之处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学理层面,回答明词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于宋元词的“异量之美”,只有这样才有明

① 明何良俊撰《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

②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③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

④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词话丛编》本。

⑤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⑥ 张仲谋《明词史·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代词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否则在观照明词的过程中,独立判断的缺席会给宋词研究的基本理念乘虚而入的机会。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例宋词研究的基本文化理念也不能成为涵盖一切的命题。正如严迪昌说“‘清词’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①,同理,“明词”也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的指称,是13世纪中晚期到17世纪中期特定历史人文精神培育的特定品,它不可能也不应成为另个时代的象征物或衬托品。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问题本身,弄清楚明词是什么,这是历史清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价值判断。因此,我们研究明词也必须回到明词本身,逼视明词与宋词在发生学上的根本歧异,从历史的迷雾中显现明词的真身。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历史人文精神的载体。反过来说,评判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可从考察这一代人入手,这也是知人论世的要求。因此,要探求明词为何呈现“异量之美”,考察明代词人应是关键一环。

从词人籍贯考察吴中作为明代词学的中心

关于中国词人产生区域,唐圭璋和吴熊和等先生均作过精要论述。吴熊和先生提出了特别是清初词派的产生地域是“环太湖地区与江南运河两岸的一些相邻州县”^②,这判断着眼于中国明清之际词产生区域的大体,非常准确。如果我们继续追索在这个区域中的词学中心到底在太湖之滨的哪个区域,则不是很清楚。唐圭璋在《两宋词人占籍考》中说:“兹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藉以觐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唐先生通过考辨两宋词人籍贯得出两宋词人中产自浙江省有216人,名列全国词人之首^③。毫无疑问,在两宋,词人主要产自浙江。那么元代、明代出产词人最多的省份又是哪一个呢?下面先以《全明词》所提供的词人小传,借用唐圭璋先生的这个思路,依据明代当时的行政区划将明代词人籍贯的分布数目作一统计,以此来“觐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进而明晰明代词学的基本格局。现将明代词人籍贯统计结果胪列

① 严迪昌《清词史·绪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吴熊和《〈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明清之际词派研究之一》,《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